

两面神既来则安：面对他者编纂文学史

◇ 韦布克·德尼克

韦布克·德尼克 (Wiebke Denecke) 在德国接受本科教育，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现在纽约巴纳德学院任教。她是研究古代汉语、古代日语、经典和世界文学的学者，合作编辑新版《诺顿世界文学选集》(2010)。她的第一部著作《“掌握”中国哲学：先秦文学的动力学》(2010) 讨论中国古代哲学。这里所收入的文章是她即出的第二部书《踏着别人的足迹：日本和拉丁作家及其自己的文学》的纲领性主张。

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起始与终结、和平与战争、原始生活与文明的双头两面神就印刻在罗马硬币上广泛流传。通常，两颗脑袋在项背连接，目光朝着相反的方向。想要勾勒出受同一个大脑支配却面朝相反方向的两颗头，这将是解剖学上的极大挑战。但我所思考的古罗马和日本早期的“双面文化”中的文学史书写却采用了——一个联合大脑的解剖学，也就是一个融合的意识中心，同时搜寻罗马文化的希腊和罗马面孔与早期日本文化的中国和日本面孔之间可疑的眼神交流。尽管在解剖学上不符合实际，在图像学上也无法解释罗马硬币，但必不可少的“异国”与“本土”文化的对抗却始终面临、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被“异国”面孔玷污的危险，这几乎构成了古罗马和早期日本的所有文化的表征。

为什么要进行这一牵强附会的比较呢？在文化历史学家鸟瞰式的眼光下，将罗马与日本并置有足够充分的理由。这两种文化都是“轴心”文明即希腊与中国文明的后裔，后两种文明在文字记载的类型、形式、词汇和修辞复杂性上都是“参照文化”；精英文化素养的定义是掌握多种语言的经典，这在罗马包括希腊语与拉丁语，在日本包括汉语、汉文 (kanbun) 和日语 (wabun)。虽然希腊—罗马、中国—日本

的跨文化轴心发展的考察由历史始然，但把罗马和日本文化并置起来又能有什么收获呢？能够为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比较项目正名的理由并不在少数。首先，从西方和东方两方面引入跨文化的时间秩序加强了比较的复杂性，削弱常常过分的西方对立于东方的二元对立解释。第二，借用较古老的“参照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看出所有两面文化中文学史书写的共通范式。第三，观察专家如何处理文学传统对自身的学科也非常有益。比较工作向来是搜集所有学科必需品的效率最高的启发式机器。以上这些原因当然是合理而有价值的，但我在本文最后还会提出一个更加充分和比较奇怪的理由。

当然，著名政治家、演说家和作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与日本第一部皇室诗集《古今和歌集》(Kokinwakashu)（后称作《古今诗集》Kokinshu）的编者之一纪淑望 (Ki no Yoshimochi) (?—919) 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西塞罗生活在晚期的罗马共和国，一个世纪前罗马征服了他的祖国希腊，西塞罗因此陷入对希腊的赞美和对希腊的征服这个双重束缚之中，同时对希腊被征服之前的古老辉煌的拉丁历史有着痛苦的意识。纪淑望生活在平安时代的皇宫里，虽然日本直到20世纪始终未征服过它的“参照文化”中国，但由始至终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将中国的汉字、治国方略、佛教和文学传入岛国的媒介多种多样，从派往和来自韩国半岛和中国的外交使节，到去中国寻求佛教真经的行游僧人，再到贩卖书籍、宗教信物和其他商品的商人。我们再次用欧洲文化史的鸟瞰视野来看，希腊城邦的灭亡和罗马帝国的衰落促使很多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时期的诗人试图重获这两者逝去的文化之一种或两种。对比之下，我们或许可以说中日两国一直到现代时期的延续导致了日本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化复兴，期间，日本始终试图追赶中国的新兴发展。

罗马帝国的征服和衰落史与日本直到现代之前的独立发展史之间的差异表现在不同的语言结构上：西塞罗生活在双语的帝国，罗马精英们需要用希腊语和拉丁语阅读、交谈甚至写作。在雅典的日常学习补充了在罗马的希腊奴隶所提供的教育。尽管双语不是均衡发展的——生活在希腊的希腊人很少学习拉丁语——但文化的变迁却是双向的。罗马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文化上影响了希腊：请注意，罗马在公元前一世纪以放弃“亚细亚风格” (“Asianist” style) 为代价，把希腊演说中的雅典模式确立为经典。

前现代的日本只能梦想对中国发生影响。当把文字带入日本的韩国移民被同化之后，只有少数到过中国的日本人会说汉语。由于缺少同中国的直接联系，日本文

学发展成一种特别的三语体,有文化意味着掌握汉语、汉文和日语的文学俗语。汉文是一种高度混杂的语言,因为尽管书写依照汉语的句法规则,它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受文体制约的特定词汇用法,从完全可能是效仿中国作家写作的汉文诗歌到非常接近日语文学的散文日记。从纯语言的角度不可能描绘这种汉文的“第三空间”。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汉文发挥了神职语言的双重功能:它是佛教神职人员和宫廷行政管理人员使用的语言,因此与男性宫廷文化和仪式礼节相关。在艺术上,汉文诗歌无疑同中国诗歌相竞争,后者作为中国大陆的皇室文学类型,或许有规范化即中国化的影响;相反,日本宫廷日记的典型体裁(kokiroku)更多地倾向于日本文学传统。^[1]

让我们再来追溯西塞罗和纪淑望(见附录)。因为中日间的文化流通实际上是单向的,中国作家不再反刍去阅读日语作品,因此纪淑望有很大的艺术创作自由。他用汉文写的《古今诗集》序言远远没有日语序言著名,后者成了日语诗学的奠基石。有趣的是,追溯日语诗歌的起源、腐化、衰落和留存希望的段落(附录,文本2b),并不在著名的日语序言中,而只在纪淑望的汉文版。也就是说,纪淑望用汉文,即日本特有的“第三空间”习语,来谴责汉文文学,谴责它导致了日语诗歌传统的衰落,《古今诗集》也许就是以实例扭转这一灭顶之灾而付出的努力。更明确地说,这相当于西塞罗用极其拉丁化的希腊语(在希腊人看来是旁门左道)撰写诗歌论文,谴责拉丁语作家创作希腊风格的诗歌,倡导前希腊风格的古罗马风格的复兴——据此批判屈从于希腊风格影响的拉丁语作家,也间接谴责了导致希腊衰亡的希腊文化本身。我们并不清楚西塞罗的罪过是否也包括语言上的傲慢——自信地强求一种希腊人看来只能是反自然的混杂语言——还是本土语言的粗俗。但无论哪种情况,这种行为都只能是供人消遣而不是可以想象的。

[1] 汉文作为语言变色龙的特性在当代日语用法中仍有表现,不区分“汉文”(Sino-Japanese)与“汉语文学”(Literary Chinese)而统称为“kanbun”(Han-writing 汉文字)。这一传统的混淆方式几个世纪以来都将“汉文”文学和中国文学视为平等或几乎完全相同的,所处的正是容纳母文化和子文化的没有边界的空间。同时,这也加剧了类似异国文学的“汉文”与“本土”日语文学遗产之间的分裂,日本的本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自18世纪就开始挖掘后者,试图创立纯净的日语文学经典。2000年,国会分类图书馆最终将“汉文文学”视为区别于中国文学的名称,从而打破了数年来曾滋生无数幻想和意识形态运动的中国与汉文文学的混淆状态。图书管理员们会欣喜地看到,他们对图书的重新归类构成了整个日语文学的一部分,也为这一重要的重新审视过程做出了必要的贡献。

然而,西塞罗和纪淑望面对本国文学发展的基本问题似乎提出了相近的解决方案:相对于参照文化的叙事模板,本土文化如何构成自己的文学史发展线索?如何补偿本土传统的“单调历史”?借用希腊和中国文学史的叙事模板既具诱惑力又存在潜在的破坏力。是的,可以整体改写他们的诗人、延用他们的风格,像崇尚自己高尚的史前史一样尊敬他们。但如何融合自己文化中既不是纯粹的延续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作家的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此外,两种后来文化中的文学发展都受到了严重扭曲,受到了时间偏差的影响。罗马诗歌始于希腊文化复兴——用希腊语说是后古典时期——的前提。早期日本诗人始于中国六朝的诗歌,这种诗歌本身就可以回溯数个世纪繁盛的诗歌传统。针对延误的挑战和时间偏差的理解,西塞罗和纪淑望都提出了类似的解决方法。

《布鲁图》是一篇教育对话(参见附录,文本1a和1b)——对话发生在西塞罗在罗马住所的柏拉图雕塑下并非偶然——参与对话的是作教师的西塞罗,友人阿提库斯(Atticus)和年轻人布鲁图(后来谋杀恺撒的凶手),西塞罗曾把拉丁语修辞的未来寄望于他。对话追溯了希腊和拉丁语修辞的发展,详细叙述了275个演说家的品质,其中大多数我们都一无所知。西塞罗强调“修辞”(eloquentia)的使用既指作为罗马共和国的精神核心——“公开演讲”的字面意义,也包含广义上的言谈和写作中语言意义的恰当和巧妙使用。

施温特将西塞罗对加图的评论称作“高潮前的高潮”。^[2]西塞罗在加图这个形象中看到了罗马演讲的“自然发展”的巅峰,是通过直觉使用修辞方法而达到完善的。尽管演讲的真正巅峰在西塞罗自己的时代——正如他自己用微妙的手段所影射的——或就是他本人,这个巅峰是“人为的”修辞在希腊影响下逐渐臻于完善的历史的一部分。加图是征服希腊之前的人物,即未被罗马征服——甚至是永远“不可征服”的时代。在当时的历史叙事中,加图在希腊史上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奇迹;西塞罗强调每种艺术形式都需要时间成熟和完善的原则,而加图是个例外。颇具讽刺意义的是,加图没有接触过修辞技巧,凭直觉应用了修辞“比喻”和手段,西塞罗

[2] Jürgen Paul Schwandt, *Prolegomena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r römischen 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 (Götting, 2000), p.112. 尽管我们观点一致,但施温特认为西塞罗通过加图的形象反对以古典雅典讲演术为模样的青年雅典派。这当然与西塞罗煽动性地把加图和著名的雅典模式黎西亚斯(Lysias)相并置,以及后来在对话中强烈抨击雅典派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我的确认为西塞罗对加图的评论不仅具有修辞的实质意义,而且达到了希腊影响之前的罗马演讲术的巅峰。

用希腊字母拼写并特意单纯地使用这些词语(附录, 文本 1b)。西塞罗依照两条时间线索,^[3]以罗马的奇迹即加图为代表的归化的“古拉丁语”, 和西塞罗谦恭地认为以自己为顶峰的高雅的“罗马希腊文化”。

纪淑望采取了相似的措施。按历史记载, 日本诗歌起源于神灵时代, 深深扎根于人心(见附录, 文本 2b)。这是(7 世纪末)柿本人麻吕(Kakinomoto no Hitomaro)写的那种诗歌, 而他本人在纪淑望的年代已经被神化了。大津太子(Prince Otsu, 663—686)时期编纂汉文诗选意味着太古风尚的历史性沦落, 而只有将人麻吕推崇为“古往今来无法超越”的永恒形象才能恢复原始的风尚(附录, 文本 2b)。这种叙事偏执于神灵之声和人麻吕之歌——当然是以汉字写成的诗歌流传下来——处于一个永恒的未加中介的地带, 并没有受到推延到大津太子时期的中国文字体系的侵蚀性影响。这里不存在《布鲁图》中颠倒的高潮, 但滞后的时间偏差通过引入另一个时间偏差而得到了解决, 即构建了一个永恒的“天赋”日本神圣诗歌的领域(附录, 文本 1a), 先于并相对于外来影响, 这种外来影响通过历史内部的情节编撰而得到了控制和限制。^[4]

正是在这种双重折射下, 我们才与西塞罗和纪淑望面对同样的问题。我们如何书写“两面”文化的文学史? 西塞罗和纪淑望这种外在解释在偏见方面已经足够复杂了, 而一旦涉及希腊和中国对罗马和日本诗歌和文学实践的影响的内在表现形式, 这个形象就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了。

昆缙连(Quintilian)以后的拉丁语文学家往往通过梳理“对著名作家的模仿”(‘imitation auctorum’)^[5]动态地研究希腊影响的隐含表现形式。(一些拉丁语文学

[3] 《布鲁图》最著名的方面就是对其多重时间框架和时间关系的精确掌握, 虽然我在此不能讨论, 但与本文论题非常相关。

[4] 史蒂芬·辛兹(Stephan Hinds)考察了如何在拉丁语文学中出于相反的目的而应用这一模式: “在奥古斯都时期的罗马文学史中, 诗歌的重要性和创新性主要源于希腊影响。但从我们能获得的早期写作中已经看出罗马文学早已受到希腊的影响。”*Allusion and Intertext* (Cambridge, 1997), p. 52. (感叹衰亡也罢, 强调创新也罢) 构建独立未受影响的背景的模式如出一辙。纪淑望的解释模式成为日本诗歌的真理, 其本身的确是真实的, 或者至少可以在历史的边界得到证实。Akiyama Ken 编著的 *Osone Jiten* (Tokyo, 2000), pp. 63, 200, 日本古典文学权威、汉文学专家 Kubota Junhe 和 Osone Shosuke 从相同的角度描述了日本和汉文诗歌之间的差异: 日文诗歌源自即兴歌曲这种说法几乎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现象, 而汉文诗歌却是中文书籍进入日本后的人为结果。

[5] 当然, 昆缙连认为模仿作为写作技巧的练习与阐释无关。但他借此创作新文本的建议影响之大, 以至于后来的作家从昆缙连获取的技巧不仅应用到创作中, 而且用来阐释现有的作品。

者会青睐现在的互文性理论家, 他们带着智慧的微笑把时髦的新酒倒进“模仿”论的旧瓶之中。)但就在过去的二十年中, 一些卓越的语文学家们已经催促学者们成功地把考据研究融入了拉丁文学史的再现之中。吉安·康特(Gian Biagio Conte)的《模仿的修辞》(*Rhetoric of Imitation*, 1986)和《拉丁语文学史》(*Latin Literature: History*, 1994)为这场争论定下了基调。拉丁语文学史在 20 世纪初之前被认为是被忽略的实体——人们或者认为它基本是希腊的, 已经没有现存的文本, 或者将其看做附属学科而忽视了。^[6]史蒂芬·辛兹(Stephen Hinds)的《典故与间文本》(*Allusion and Intertext*)通过细读分析了“文学史叙事”, 包括拉丁语文学的创新主张、衰亡的叙事、或“新”“旧”诗人。尽管辛兹没有使用这一术语(但似乎不幸地把他的研究标识为“主观主义文学史”),^[7]他却实践了别人所说的“内在文学史”或文学史的“现象学”。^[8]

“内在文学史”消除文学史的外在叙述——传统上所说的“批评”——和内在实践之间的区别, 这种内在实践就是通过追溯拉丁语作者与希腊语(或拉丁语)先驱的准确的自我定位而细致分析的文学史。简言之, 这种研究不是把拉丁语文学作为文学, 而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写字板, 上面的每一种铭写都有意或无意地划定了自身相比于前一个传统的位置。^[9]从辛兹的“文学史叙事”一章推断, 作为未来文学史之结构性标题的作家、流派和作品都可能被不同的目的论(*teleologies*)所取代, 如辛兹在“文学史”一章中讨论的四个问题。在关于西塞罗和纪淑望的探讨中, 我们只涉及一种目的论, 时间线索的建构和处理两面文化中时间滞差的方法。

“文学史”因而将成为各种目的论的平行表征。用一种尴尬的名称来说, 文学史将成为目的论学(*teleologography*), 所研究的条目包括: 与参照文化相关的衰落叙事; 古代和现代文化之争, 参照文化的优越感和补偿这种僭越的自我讽刺行为; 以参照文化为掩盖的自我塑造和突然开放的行为; 沿着口述、自发、自然、永恒轨道编

[6] 见 Schwindt, *Prolegomena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r römischen 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 pp. 22—35.

[7] Stephan Hinds, *Allusion and Intertext*, p. 123.

[8] 见 Ernst A. Schmidt (ed.), *L'histoire Littéraire immanente dans la poésie latine* (Geneva, 2001) 和 Schwindt, *Prolegomena zu einer Phänomenologie der römischen Literaturgeschichtsschreibung*. 相对于现象学的方法, 施温特选择讨论传统被认为是散在的“文学史”亚样式, 从而保留了内在历史编撰意欲放弃的文学和批评之间的差异。

[9] 在这个意义上, “内在文学史”是所有传统文学史的书写模式, 不仅仅包含本文探讨的双边文学。

撰的本土传统，以对立干沿着文字、工艺、人为和历史轨道编撰的参照文化；母系和子系文化的二元并置，^[10] 文学文本中的代码转换功能，等等。^[11]

当然，将模仿的例子历史化为文学史叙事的一种阐释学毫无畏惧地具备不确定性。借用理查德·托马斯 (Richard Thomas) 的一个有用的术语说，我们总是无法把偶然的“聚合”与故意“参照”区别开来。^[12] 内在文学史是种苛求，因为它要求我们建设性地妄想传统在传统内部的回归和在传统外构建传统。作为一种思想试验，我们应不应当在研读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 的同时不去思考荷马史诗的存在呢？这是否可行？是否有其他意义？(在很多资料已经遗失的情况下研究古代传统，这是种可笑但却有效的方法。)

另外，我们面临跨越语言障碍追溯模仿的挑战，这种情况下，追溯类似的词法或句法结构可能会失败，但回到“转义”、“主题”或“形象”上来又似乎过于模糊，无法辨别影射的意义。^[13] 跨越语言边界的态度主要取决于该领域的政治。跨越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模仿”无可厚非地令人惊奇，却无人在汉文诗歌和日语诗歌之间进行探讨。对比之下，汉文和汉语诗歌之间的干扰往往被夸大，汉文文学被看做语言障碍的中文方面，即日语领域产生的一个外来因素。这些观察与包含汉语、汉文和日语文学 (“wakan hikaku bungaku”) 在内的“比较”研究不谋而合。对拉丁语学者而言，这当然意味着研究希腊语料，他们几乎从未意识到自己的研究具有任何“比较”的意义。日语文学学者 (或任何现存的欧洲民族文学传统) 更希望同自己的邻居保持“比较”的距离。古罗马和早期日本文学之间的比较是不对称的，这绝不是因为两个学术领域之间的显著差异。与任何语文学研究相比，古典研究是跨国界的全球学科——至少在西方语境下——任何学者都有正当理由做出贡献。相反，

[10] 罗马一方最著名的有希腊和罗马政治文化巨人奈波斯 (Nepos)、苏东尼斯 (Suetonius)、普鲁塔克 (Plutarch)。日本一方有平安时期的诗文集，收录了日语、汉文和中文诗歌，如新撰《万叶集》(Shinsen Man'yōshū)、《江千里集》(Chisatoshū) 和《河汉朗咏集》(Wakan rōeishū) 及其续集。

[11] 我当然清楚关于这些主题已经有很多著述，但我认为依据“目的学” (teleologography) 重新调整研究重心，将改变其状况和结果。

[12] Richard Thomas, "Virgil's Georgics and the Art of Reference,"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90, pp.171-198. 有关不确定性另参见 Alessandro Barchiesi "Some Points on a Map of Shipwrecks," in his *Speaking Volumes* (2001), pp.141-155.

[13] 在跨越语言障碍研究模仿方面，翻译应该作为第一种模仿类型：例如，日本的“主题诗歌”选取著名中国诗歌的部分，翻译成适宜完整的和歌 (waka poetry)，可以称作翻译，又不仅仅是翻译。(想象一下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后第一节翻译成 Baiku 诗歌！)

日本文学的编年史属于现存民族—国家的问题。很难想象被边缘化的中国影响和汉文学史能够得到重视，因为它对于日本民族意识是一个矛盾的领域，而对当下民族文学史又是隐含的谴责。这个问题也同样不足以引起中国学者的兴趣，他们当然以对整个东亚的构成性的历史影响引以为豪，认为不值得去追溯多少世纪以来中国辐射的文化影响的确切能动力。最后，与研究非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学者一样，研究日本文学的西方学者在民族文学史的建构方面也面临合理化的问题。

那么，有什么其他方法可以替代汉文文学的防卫性“比较”呢？或在更普遍的意义，“比较”的反义词是什么？鉴于“比较”涉及选择和自由选择，它的一个反义词应该是“迫切”。是否同时考察两种传统，对此我们别无选择，如在古典研究中，比较似乎“迫在眉睫”。这使我们再次回到两面神的分析上来。是对视双方还是避开眼神交流，两面神的两张脸属于同一个生物。最令人不安的是，两面神的解剖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大卫·达姆罗什提出重新确定“世界文学”的定义，从一系列有影响的经典作品不断扩展阅读经验：

一旦几部外国作品在我们的脑海里引起共鸣，世界文学就完全发挥作用了。这为比较学者的潜在恐慌提供了解决办法：世界文学不是必须但又无从掌握的巨量文本；而是一种阅读方式，对几部作品的集中体验与大量广泛的探讨同样有效。^[14]

尽管构成世界文学的文本在历史和地理维度上差异很大，这些文本在世界文学的读者的精神中聚合起来。通过投身于历史上毫无关联的传统的经典研究，为接受东西方经典阅读哺育的西方读者提供东亚文学史，这些传统就在历史上与我们特定的现实关联起来，也就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历史的现在 (Jetztzeit)。如果我们同时接触这些传统，并为没有时间接受语言训练、自身无法进入这些宝库的人提供翻译、注释、阅读笔记等，那么，即使无关的传统也能接受较少的“比较”了。自东亚和西方文化史上开始相互影响的时刻起，即便这次文化接触之前的各个时期就已经获得了一种次要的历史相关性，本雅明眼中的这些目击者就都成了在现在贩卖古代历史和文学的商人。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始时保证要说明的——比较研究中最奇异、最迷人、最迫切的动力和动机。我们的努力必将影响到这些文本的未来和未来的文本。

[14] David Damrosch,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98-299.

附录

西塞罗《布鲁图》(47BC)

文本 1a

至于加图，当今我们身边还有哪些演说家读他的作品？还有谁了解他？可是，天哪，多么伟大的一个人啊！[……]应当从他的演说中选取值得注意和赞扬的篇章；可以从中找到演说的全部美德[……]

文本 1b

希腊人认为这是语言的修饰，如果用单个词语的替换，他们称此为转义，句子和篇章的润色，他们称作图解；加图在这两种方法的应用上的多样性和娴熟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当然，我不得不承认他作为演说家语言还不够精良，还有待不断地追求完善；而这并不奇怪，按照我们时代的理由，他生活的时期太过古老，在他之前不存在值得阅读的文本。

纪淑望《古今诗集》的汉文序言 (AD 905)

文本 2a

日本诗歌扎根于人心，在词汇的森林中绽放花朵。[……]在神灵时代的七代人期间，时间是纯朴的，人是纯净的。情感与欲望没有分离，日本诗歌尚未兴起。后来，到素盏鸣尊 (Susanoo) 抵达出云 (Izumo) 时，我们才有了三十一首原音诗歌。

文本 2b

大津太子时期，抒情诗和押韵散文（汉语类别）开始兴起，诗才们欣赏这种题材，将其传承下来。他们引入汉字，改变了日本习俗。民族的行为方式彻底改变了，日本诗歌逐渐衰落。但我们仍然拥有杰出的大师柿本人麻吕，他拥有对神圣奇迹的永恒记忆，只有他无与伦比地跨越现在与过去。

(尹 星 / 译 陈永国 / 校)

跨太平洋生态学： 梵语中的山狗和汉语中的猴子

◇ 魏模和

魏模和 (Wai Chee Dimock)，耶鲁大学英语和美国学教授。她曾率先研究美国文学与世界上其他文学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早期研究赫曼·麦尔维尔小说的专著《自由帝国：麦尔维尔与个人主义诗学》(1989) 发表之后，她在《正义的残余》(1996) 中继续探讨文学与法律的关系；并与劳伦斯·布埃尔 (Lawrence Buell) 合编《地球的阴影：作为世界文学的美国文学》(2007)。本书收入的文章摘自《穿过其他大陆：跨越深度时间的美国文学》(2006)，文中，魏模和运用地理和天文时间作为类比来给美国文学定位，认为美国文学是世界构架的组成部分，是深度时间的结果。

如果将伦理学的界限拓展、将其成员扩展到不仅包含人类居民，那么伦理学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我们允许美国文学如法炮制，参照这个星球的多样性，容纳不只一个物种、一类居民的生物环境，那么，美国文学又会呈现出什么景象？

本章通过搭建跨太平洋亲缘关系的弧线探讨以上问题。加里·施奈德 (Gary Snyder) 的受佛教感染的生态学将通过梵文史诗《罗摩衍那》(Ramayana) 打开一个回归历史的回环，其主人公猴神哈努曼 (Hanuman) 将我们相继带往中国、带往16世纪的小说《西游记》。同时，美国本土作家和亚裔作家的交叉往来——莱斯利·西尔克 (Leslie Silko)、西蒙·奥蒂斯 (Simon Ortiz)、杰拉德·维兹诺 (Gerald Vizenor)、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 ——围绕这一迂回道路，编织出更复杂更具活力的光环。这些文本不但提供了亚洲和美国的交流通道，更为我们提供了构成一种新型生态学的各种因素，因为正是在这些循环轨道中，我们才最有可能看到动物担当主角，面对非人类生物的事例，促使我们对人类进行重新思考。